

西南之“外”：文明与生活的民族志

——本栏目序^①

王铭铭

2004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作题为“所谓‘天下’,所谓‘世界观’”的讲座,提出“三圈说”^[1](P.137-138),其后,又发表了《“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等文章,重申其关于“三圈”的主张。^[2]所谓“三圈说”是基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而提出的,它将中国人的“世界”划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其中,核心圈主要是汉人聚居区;中间圈是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部、东南沿海的少数民族和长城以外的草原民族;外圈则指今天国境线以外的国家。“三圈”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世界分区,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术分区。

可以认为,近代中国是由这三圈构成的“天下”转变而成的,其结局乃是有明确国境线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诞生一方面使核心圈的农民和中间圈的少数民族内化为国家和学术研究的内部“他者”,使外圈中真正的异文化在学术研究中变成“至今仍然是中国人类学的最外围和最不发达的部分”^[1](P.138),“国家”从总体上成为唯一的关注出发点。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一些汉人农村研究试图通过村庄反映和改造社会现实,如让农民“现代化”,一些少数民族研究则服务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制定与维持。两种内部“他者”成为国家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对象”,甚至成为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不再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存在。

然而,不应忘却,从古至今先贤们早已积淀下不为国族疆界所囿而以他者之眼反观己身与他者的行游与书写。周代穆天子朝拜西王母,汉唐高僧去西天求取真经,宋元以降众多的异域志书,它们构成对“华夏世界”另一半的理解。即使在中国饱受欺凌之时,晚清的士大夫和民国的知识分子依然在“他处”思考着“天下”兴亡,如钟叔河先生在其编纂的《走向世界丛书》中收录的晚清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当人类学这个西

来品在中国发轫之始,前辈便开拓出它的海外研究,如李安宅《祖尼人:一些观察和质疑》、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眼光,带着中国自身的关怀,认识、理解和书写着作为“他者”的异文化,在这个我看人、人亦看我的过程中,中国与作为外圈的海外世界都展现出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丰富认识论,这些书写构成中外之间一块知识互惠的基石。

“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3](P.93),“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为儋而珠崖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3](P.95)这两段史料勾勒出早至汉代,从中国西南通往印度、从东南行至东南亚的路线。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东南核心圈的汉人社会,还是西南中间圈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所谓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与外圈保持着密切往来。所以,三圈并非如国家疆界般为的是划出区分与差异,而是寻找它们之间的通性。“通”既是共通——彼此相似的共同特征,也是沟通——各圈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譬如,在东南,汉人移民从中原迁入以前,当地的原住民属于百越民族,天高皇帝远,地方行政体制的不发达使当地也存在过诸如西南少数民族封建式的分权政体;越人与海外南岛语族之间来往密切,这使得其后当地海外贸易繁盛,又由此接纳了海外“诸蕃”,形成“市井十洲人”的景象。而在西南,从秦灭巴蜀到元明的征服,这个所谓的帝国边陲也接受着自上而下的汉文明教化。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在《上缅甸诸政治体制》中写道:“绝对可以相信的一项事实是中国人早在西元第一世纪就已知道从云南去印度的几条通道了。”^[4](P.41)可见,“西南夷”地界上的纵横山水不是文化的梗阻,而是中国

与印度两大文明间的沟通枢纽。各圈之间不乏贸易、军事、文化等交流往来,有时甚至还曾有过彼此更替。从百越民族到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笔下汉人社会宗族研究的范式,东南在汉人南下移民潮中转变成核心圈;元、清两朝却是中间圈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帝国;今天国境线外中南半岛与中国接壤的某些地方曾是古代中国治下的郡县。

以三圈划分的学术区域,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汉人、少数民族或海外的研究。我在“西南与东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一文中梳理过三个圈子的学术史^[5]。东南在汉人的宗族与宗教研究之外,还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惠祥先生开创的“民族”研究,形成东南人类学的两条脉络。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北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机构迁往西南,展开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穿行、跨越这三圈的前辈学者,为每个圈子都留下了极为精彩的论著,如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到一系列域外随笔,林耀华先生的《义序的宗族》和《凉山彝家》,田汝康先生的《沙捞越的华人》(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和《芒市边民的摆》。核心圈与中间圈的学术研究亦深受海外学者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类学曾广拜外圈诸国最顶尖的人类学者为师,另一方面,海外汉学家们也纷纷远道而来。如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l),以台湾、东南地区汉人的家庭、械斗等研究起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西南彝族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调查,这使他在“外圈”中声名鹊起,开创了海外中国人类学以族群研究为核心的一个时代。

“就克钦山区而言,传统人类学里‘一个社会’之概念造出了许多难题。”^{[4] P.6}这是利奇在《上缅甸诸政治体制》中的感慨,因为“这些人使用众多不同的语言与方言,而且区内的各处在文化上皆有很大的差异”^{[4] P.1},“但是讲不同语言、穿不同服饰、拜不同神灵的人并不被认为是完全超出社交往来的异乡人。”^{[4] P.18}由此,利奇含蓄地批评了“社会团结”、“文化统一”等被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认为是奄奄一息的社会,人类学家却视之为既健康又幸运。相反,任何社会若有内部冲突则被怀疑是在“失序”与病态解体中。利奇的话传达出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有其无法容纳的混杂现象,二是人类学家扎进去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或许超越了诸多“社会”的界限。

本专题三篇关于异域的民族志,都是对这种

“失序”和“混沌”世界的描述。梁永佳对于印度占星术与现代科学的描述,指出印度自身的历史与文化造就了宗教与科学和谐共处的印度智慧。陈波的“域外民族志:以尼泊尔洛域为例”借助不懂“社会”一词含义的洛域人的本土概念“域”,呈现出尼泊尔与周边汉文明和南亚文明之结构关系。“社会”无法容纳却又实实在在存在于当地“世界”之中的还有土著的非土著知识,以及当地人对于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各种文明在此交汇,使得当地借以建立生活秩序的观念或是充满矛盾,或是容许有多重选择。罗杨关于柬埔寨人生活观的阐述,揭示出当地人综合了外来的印度教和佛教两种宗教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

这三篇关于南亚和东南亚的民族志,实则是从中间圈的“藏彝走廊”向南延伸,都旨在从一个更大的历史和地理区域内,探寻文明如何在彼此的关联中形成和塑造。我曾用“文质彬彬”来概括中间圈的特征,所谓“文质彬彬”便是“一种中国式的文明理论,这个理论不同于‘冲突论’,又不同于只关心自我与超我的社会心理学,它侧重的是处理关系的智慧。所谓关系,不同地带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类。这类关系的智慧注重的不是认同,而是处于不同认同之间的心态。”^{[2] P.73}倘若将“中间圈”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乃至面对各种纷繁交融的文化现象时的一种心态,那么,本组文章书写的“外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中间圈”。

注释:

①本文的写作得到学生罗杨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王铭铭.所谓“天下”,所谓“世界观”[A]//王铭铭.没有后门的教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2]王铭铭.“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A]//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3]陈序经.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 [4][英]李区(Edmund Leach).上缅甸诸政治体制[M].张恭启、黄道琳译.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
- [5]王铭铭.西南与东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Z].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作者简介:王铭铭(1962-),男,福建泉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北京 100871

本期重要 作者介绍



王铭铭

教授

王铭铭，1962年生，福建泉州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后于1987年赴英留学，1993年获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人类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曾作为伦敦城市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中国乡村研究，在爱丁堡大学从事中国传统宇宙观的研究。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铭铭教授早期主要从事中国东部汉人“核心圈”的乡村与城市研究，如《社区的历程》（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

（1997）、《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99）、《走在乡土上》（2003），针对乡土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城市文化史与城乡关系，展开人类学式分析；亦致力于引介海外汉学人类学，如《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人类学是什么》（2003）、《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5）等，探讨社会科学的“汉语叙述”。在大量的人类学理论与东部经验之后，王铭铭教授的研究转向他所谓的“中间圈”，即少数民族众多的西部“藏彝走廊”地带，借助他提出的“关系主义民族学”，对社会科学中诸如“社会”、“民族”、“国家”、“族群”等概念加以反思，强调动态地研究人、物、事，如《心与物游》（2006）、《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2007）、《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人生史与人类学》（2010），以更综合的方式呈现出中国式的社会观与文明理论，探索“非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及民族学的可能方式。除“核心圈”与“中间圈”的研究，王铭铭教授试图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及海外博物志传统中，拓展中国人类学的视野，如

《无处非中》（2003）、《没有后门的教室》（2006）、《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2007），用古代中国的世界视野，造就社会科学知识互惠的平台。

此外，王铭铭教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英文论著Grassroots Charisma: 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草根卡里斯玛》，2002，合著）、Empire and Local World: A Chinese Model for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帝国与地区性的世界》，2008），编著了《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2008）、《人类学讲义稿》（2010）等综合性著作，并担任《中国人类学评论》1至22期主编。

王铭铭教授曾担任“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再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研究项目“多民族聚落与文化互动研究：以藏彝走廊为例”等课题的负责人。曾于2000年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访问教授，讲授博士课程“人类学的中国问题”。1998年至今担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海外会员、英国《国际文化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学术编委。被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南京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特聘教授等。曾荣获第二届国家教育部青年教师奖、2003年国家图书奖等荣誉。

王铭铭教授还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方向硕士点、博士点的导师，承担“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神话学与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等课程。